



## 内容摘要

教会大学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庇护下，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基督教会开办在中国的教会大学主要有 16 所。在这 16 所教会大学中，以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最为著名。文章选取上述三所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校训的涵义及来源，论述了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拟定经过，探讨了校训在各自办学历程中的作用，分析了校训拟定者各自的教育思想，最后对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作出评价。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以时间为顺序，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及校训拟定者所持的教育观念，述介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拟定经过；另一方面，对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内容进行剖析，在探讨实践意义的基础上，对其思想渊源进行考察。

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中西方对校训的不同释义，阐述了校训的涵义和来源。

第二部分：以时间为顺序，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背景，述介了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拟定经过。

第三部分：对知名教会大学在校训确立后的办学绩效进行介绍，试图从实践层面说明校训的历史作用。

第四部分：从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内涵方面探讨校训拟定者各自的教育思想。

第五部分：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进行分析，作出评价。

**关键词：**知名教会大学 校训 研究



## Abstract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re some kind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et up by western Missions in China with the invasion of imperial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aegis of some unfair treaties. From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to early 20<sup>th</sup> century, missions established 16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mong which St. John's University, Nanking University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are the most famous. The writer chooses these three universities as the researching subjects, discloses the meaning and the origin of the mottoes,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mottoes' establishment, discusses their functions in the midst of university-establishing, analyzes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motto-establishers, and finally gives the justified assessment of mottoes. The writer adopts a special method, trying to find some important points from the trivial. Specifically speaking, on the one hand,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consider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and the motto-establishers'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writer states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motto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riter analyzes the content of the mottoes,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the thoughts from the practical aspect.

Besides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there are five parts in this thesis.

Part One discloses the meaning and origin of motto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explanations in the west and in China.

Part Two indicates the process of mottoes' establishment chronologicall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China.

Part Three introduces the achievement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ttoes in these three famous universities, aiming at the illustr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their historical functions.

Part Four discusses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the establishers respectively via mottoes' meanings.

Part Five makes an objective assessment on mottoes.

**Key words:** well-known Christian universities; mottoes; research



##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07年5月26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半年；一年；二年发布。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07年5月26日



## 引言

鸦片战争前，已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但人数很少且不受法律保护。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外国传教士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力，开始大批涌入中国，企图以基督征服中国。然而，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基督教被视为“异端”而遭排斥，传教士单纯地传教布道收效甚微。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开办学校，希望以学校为媒介达到迂回传教的目的。因此，由传教士开办的初、中等教会学校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到1900年，教会学校总数为2000所左右，在校学生人数大约4万，其中教会中学约占10%。<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教会大学应运而生。教会大学是由欧美各类教会团体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最初是外来事物，正如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大学研究的芳威廉博士所言：“早期由于（中国）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sup>②</sup>虽然教会大学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产物，但客观上它是中国新式大学的“先驱”和“范本”。校训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也不例外。

诚然，教会大学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伴而来的，在其初始阶段，又主要是为基督教的传播服务的，早期的教会大学，无论是教育思想还是管理模式，都是从西方教会（或教派）大学（或学院）移植而来。因此，其发展，从思想理念到制度模式都深深打上西方的烙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国力更为衰弱。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实行新政，颁布学制，废除科举，奖励留学，掀起兴办学堂的热潮。这些举措为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辛亥革命后，经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华民族逐渐觉醒。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新教育的发展，使教会大学面临新的挑战。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教会大学不能不作相应的自我调适，经历了本土化、人间化、学术化的艰苦历程，<sup>③</sup>这一点，从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制订及变化中也有所反映。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教会大学，主要有16所。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3所。此外，还有一些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这些学校，多数为美国和英国的教会所办。据

<sup>①</sup>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sup>②</sup> William B. Fenn,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Michigan, P. III.

<sup>③</sup>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序言），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统计, 20 世纪 30~40 年代, 在教会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 12%~20%,<sup>①</sup> 1947 年秋达到 11, 000 人, 而考生则 10 倍于此数。<sup>②</sup> 为什么教会大学在旧中国有这么大的感召力, 吸引如此多的中国学生报考? 在笔者看来, 主要原因是, 这些教会大学以其良好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成效赢得了国人的认可, 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会大学。这些知名的教会大学, 虽然数目不多, 存在的时间不长 (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消或并入其它院校), 然而却是教会大学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它们把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和观念带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领域, 使得当时西方大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课程设置、教学管理, 甚至西方大学的校园文化迅速传播开来。校训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是学校的灵魂, 也是学校精神的表征, 它集中反映学校主办者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 因此倍受学校主办者的重视。他们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 通过校训这一载体来表达自己的教育理想, 明确对受教育者的要求, 激励师生追求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 从而对学生个人和学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仔细查阅了几所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 从中发现,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折射出校训拟定者与众不同的教育思想, 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宝库中可资借鉴的特殊部类。

<sup>①</sup> 汪一驹著, 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 台北枫城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2 页。

<sup>②</sup> 谭献民:《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 第 85 页。



## 一、校训的涵义及来源

校训最先出现在西方。中日甲午战争后，校训的名称方由日本传入中国。校训虽然是由西方传到日本，再由日本传到我国，但是中、西方对校训的释义不尽相同。在研究中国知名教会大学校训前，我们首先要厘清校训的涵义及来源。

### （一）校训的涵义

什么是校训？中华书局初版《辞海》这样解释：“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上海教育出版 1992 年版的《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对校训的释义是：“学校为树立优良校风而制定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的准则。”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认为，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学生具有指导意义的词语”，同时“校训即是学校着意建树的特有精神的表征。”<sup>①</sup> 南京大学蒋树生校长则认为：“校训是学校制定的对全校师生具有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是对学校办学传统和办学目的的高度概括。”<sup>②</sup> 教育部原副部长袁贵仁在《开展大学文化研究，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工作》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校训，不过是一所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

校训一词的英文是:school precepts, motto for school discipline。从英文词义看，校训是一种格言、箴言、座右铭。它代表某种道德价值及其追求，反映的是学校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表达的是学校主办者对求学者的热切希望和要求。

从上述中、西方对校训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归纳出校训的几个基本要素：第一，校训句式简短，但寓意深刻；第二，校训具有训育功能，代表某种道德价值观念；第三，校训是学校着意建树的特有精神的表征，是学校主办者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所以校训的意义，在于通过简短的语句来表达主办者对求学者的期望和要求，体现了学校主办者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反映了学校特有的精神风貌。

### （二）校训的来源

英文中的校训，起源于意大利语 Motto。翻译成中文，就是格言之意。用在学校校徽上，即可翻译成校训。目前对校训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它源于军事口号(war cries)。欧洲在 16 世纪后，徽章和格言开始组合使用。当时有许多关于格言的书籍，

<sup>①</sup> 陈桂生：《校训研究》，《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第 33 页。

<sup>②</sup> 蒋树生：《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江苏高教》2002 年第 4 期，第 12 页。



提出了如何创作格言的规则。如格言既不要模糊，也不要太直白，在字义上应该是积极向上的等等。正是通过格言这一中介，最初的军事口号才逐渐演变为西方大学的校训。<sup>①</sup>

作为世界上一些古老的大学，其校训的原文大多是用拉丁文写的，反映了这些大学悠久的历史。如英国牛津大学的校训，翻译成中文，就是“上帝乃知识之神”或“主照亮我。”剑桥大学的校训是：“剑桥——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和光。”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是：“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校训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以上西方著名大学校训可以看出，西方大学的校训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所信奉的教育理念与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突出特点，是个性鲜明，偏爱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且大多来源于西方经典或生活格言。

据华东师范大学王彩霞博士考证，我国古代没有出现“校训”二字单独成词的先例。从现今所发现的资料来看，我国现代汉语中的“校训”这个词是从日本引进的。据王彩霞推断，引进的时间大约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到1914年之前。<sup>②</sup>这是“校训”的中文名称来源。在“校训”一词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早已有了家训、庭训、族训等等词义相类的名词。即使在学校教育领域并没有“校训”的名称，但是已经有“校训”之实。书院的出现，使得古代“校训”产生发端于书院成为可能。唐末书院主要担负收藏、校勘、整理图书的任务。到五代时，书院成为私人讲学的场所。发展到南宋，书院成了一种有计划、有组织且功能比较完善的由私人自行管理的教育机构。这时的书院，绝大多数体现了创办者的教育思想和办学追求，他们用一些精练的语句作为院训，来教导求学者做人的道理和治学的方法。例如，长沙岳麓书院的院训是“忠孝廉洁”。它由南宋著名的大学问家朱熹亲书于讲堂，是中国古代成型了的堪称“校训”的院训。它言简意赅，便于学生记忆，和现在的校训并无多大差别，只是当时没有明确冠以“校训”之名而已。这则“忠孝廉洁”的院训，集中体现的是对人性的关怀和以德育人的精神，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强调“仁”，强调“善”，注重德行的修养。在它的影响下，后世也涌现出了一批精品院训。如无锡东林书院的门联院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又如贵州永宁书院的院训：“格物、诚正、修养，知所先则近道；孝悌、谨信、亲爱，行有余以学文。”可见，这些院训可称为中国古代的“校训”，只是没有校训的明确名称

<sup>①</sup> 林为连、张国昌、许为民、郁怡汶：《国内外知名高校校训评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第35卷第6期，第130页。

<sup>②</sup> 王彩霞：《试探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起源》，《高教探索》2006年第2期，第32页。



而已，它们可视为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先声。

到了近代，教会大学已有“motto”（校训），只是当时未能以明确的中文“校训”概念称呼它罢了。徐以骅先生在其著作《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中提到：“圣约翰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学校，它先后采用诸如考试名誉制、选科制、学分制、导师制等西方早已实行的制度，有的在中国尚属首次。其它如毕业典礼、校歌、校旗、校徽（蓝与黑）、校训（光和真理），也是西方的舶来品。所有这些自本世纪以来在一所中国学校也是习以为常的，然而当它们被圣约翰等教会学校引进时，却开风气之先。”这样看来，是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把校训这一西方舶来品引进中国的。<sup>①</sup> 在圣约翰大学的带动下，以后其它教会大学也仿效西方的大学提出了各自的校训。如东吴大学的校训：“Unto a Full Grown Man”（译成中文为“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或“法古今完人”）；华南女子大学的校训：“Saved for Service”（译成中文为“受当施”）；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Abundant Life”（译成中文为“厚生”）。这样，从日本引进的“校训”名称和教会大学“motto”（校训）实体相对应，便完成了“校训”这个概念的中国化。在中国学术界认可和采用这一概念后，校训才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sup>②</sup> 此后，校训也普遍被中国近代新式大学所采用和接纳，并涌现出一批寓意深刻、催人奋进、富有时代特色的著名大学校训。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sup>①</sup> 王彩霞：《试探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起源》，《高教探索》2006年第2期，第35页。



## 二、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拟定

教会大学是指从19世纪末起西方基督教会在我国领土上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sup>①</sup> 西方传教士在我国领土上建立的教会大学主要有16所，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创设的大学有13所，由罗马天主教创设的有3所。

知名教会大学是指办学规模较大、学术水平较高、社会知名度较响的三所综合性教会大学，即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

### （一）圣约翰大学校训的拟定

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我国上海创设的。其前身，是1879年在培雅书院、度恩书院以及神道学校的基础上设立的圣约翰书院。1895年起，该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905年，学校成为正式的大学，并在美国华盛顿州注册。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个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大学。1913年，圣约翰大学又开始招收研究生。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拥有5个学院（原来的4个加上后来的农学院）16个系的综合性教会大学，是当时上海乃至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是我国最早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教会大学，同时也是唯一用外国名字命名的教会大学，曾被誉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所”<sup>②</sup>。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最初是英文的“Light and Truth”。翻译成中文就是“光和真理”。意思是激励青年皈依上帝或接受“基督化的品格”的感染，将来能在走向社会时，发挥“人民的先生和领袖”的作用。该校校训与美国著名的教会大学——耶鲁大学的校训相同，只是“光”与“真理”二词的位置倒置。校长卜舛济看到“美国古大学图书馆，大书希伯来文。光与真理一语，本校即以是为校训，为真理光”<sup>③</sup>。卜舛济借此来作为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是希望通过培育牧师来教化人民，发展教派，光大教义。他认为：“本校以为德重于学，此基督教之旨，必当发挥而光大之也。”<sup>④</sup> 圣约翰大学的校训虽然只有短短的数字，却反映了卜舛济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想。卜舛济是秉持着“宣教高于一切”的信念来到中国的。最初对教会教育的兴趣不大。1888年6月卜舛济出任卜舛济书院监督时，年仅24岁。起初，他并不愿在圣约翰书院工作，

<sup>①</sup>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sup>②</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sup>③</sup>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sup>④</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后来改变初衷，进而全身心地投入教会教育。他认为，教会大学应直接为教会服务，若仅仅依靠直接传道，无异于“沙上建屋”。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必须建立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把更多的青年置于自己的学校中。他曾写道：“在努力工作和更多支持下，有朝一日我们将在此建立一所伟大的教会学府。”<sup>①</sup>他还认为“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而且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和最有力的影响。”<sup>②</sup>卜舫济要仿效的是美国的著名大学，而非“只有两名教授和相应设施的小型学院”。卜舫济认为教会大学首先是宣教，其次才是教育。五四运动后，“反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教育独立运动在中国递次兴起，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教会学校也面临空前压力。由于中国政府要求所有的教会学校必须注册立案，否则不准招生。圣约翰大学担心立案会妨碍学校的宗教性及其宣教机构的地位，所以迟迟不肯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其后又担心不立案，学校会被关闭。在权衡利弊后，卜舫济认为：“我个人得出结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立案总比关闭学校好……我相信在困难之中继续开办，比因我们的自由受限制而放弃更符合基督精神。”<sup>③</sup>所以也陆续采取了一些与立案有关的措施，如将宗教课改为选修课，增加中国教师的人数等，作为立案的铺垫或预备。当他看到要立案求须有中文校训一款时，卜舫济思考了良久，准备对原来的校训进行改定，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中文校训也要反映圣约翰大学的宣教性，要为教会教育服务。卜舫济来华后，对底蕴深厚的儒家文化颇有感触，他认为，儒家文化是“令人难忘的、有启发性的”，且“纯洁、尊贵”，“代表了中国最高理想”。他看到，孔子和儒家文化在塑造中国人的性格与中华文明方面的力量，想通过儒家文化的影响来强化基督教教义。他特别推崇孔子的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这句话讲的是学习的方法，是一条中性格言，既无宗教色彩，也无政治色彩，且富含辩证法，对理解基督教教义有所帮助，因而不会影响学校的宣教性。于是他在1931年第一次申请立案时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定为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校训。

## （二）金陵大学校训的拟定

金陵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是基督教会在南京设立的一所高等学校，它在我国教会大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金陵大学的前身之一，是始建于1888年的汇文书院。1910年南京育宏书院(The Union College)并入汇文书院，改称金陵大学。学校成立之初，并没有拟定校训。是时，金陵大学的办学宗旨是培养

<sup>①</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sup>②</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学生的“基督化人格”，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sup>①</sup>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当时学校的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因此学校最初仅设文科及若干数理课程，陶行知、陈裕光等即为该校的第一批学生。

20世纪20年代“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后，北京政府要求各级各类教会学校均须立案注册，且规定董事会中华人人数过半，须由华人出任校长。于是在1927年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有了第一位华人校长——陈裕光。陈裕光认为，教会“在我国办学，理应尊重我国主权”。因此他在就职当天就明确提出，按我国政府法令筹备立案是“刻不容缓的第一件大事”。学校于1927年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1928年获批准。立案后，学校逐渐改变其性质，获得了稳步、健康的发展。到抗战前，学校发展成为文、理、农兼办的综合性大学，下设20个系科，其中尤以农科最为出色，学校享有“钟山之英”和“南国雄”的美称。

在1942年2月23日的“国父纪念周”上，陈裕光在《校长训词》中，明确将真、诚、勤、仁定为金大的校训。提出校训的这篇《校长训词》原文如下：

今日何日，即4年前本校迁蓉正式上课之一日是也。原八一三事变起，京都各校遵照教育部命令纷纷他迁，人心惶惶。本校以在京有悠久历史，且未经轰炸损失，故为安定首都人心起见，决留京开学以维持首都气象。全校师生在敌机扰乱频仍之际，犹能继续教学。迨战事迫近宁垣，迅即设法离京西迁。时舟车稀少，交通梗阻，幸赖全校同仁同学同心协力，历尽艰苦，始能分批入川。时光逝水，倏忽4载，回忆过去，不能无感于中。兹有三事足资纪念者。一曰坚强之意志，二曰苦干的精神，两者皆为在抗战中所特别体验者。三曰真诚勤仁之行动，此即本校创立50余年之校训也。三者，正与新式大学教育本旨相符合。盖现今之大学教育为一躯壳，而坚强之意志、苦干之精神，与夫真诚勤仁之行动为其灵魂；躯壳与灵魂齐备，而后大学教育始称完善。<sup>②</sup>

百日之后，陈裕光在《赠本届毕业同学》一文中，对金大的校训予以阐释。不同的是，陈裕光将校训中的“真、诚、勤、仁”前两个字调换了位置，改成了“诚、真、勤、仁”。因为他认为，在办学治校中，“诚”最重要，还可避免“真、诚、勤、仁”中将“真、诚”理解为“真诚”这一歧义的出现。他在《赠本届毕业同学》一文中，是这样对校训进行解释的：

《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子曰：“言忠

<sup>①</sup> 陈裕光：《回忆南京金陵大学（节录）》，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

<sup>②</sup>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信，行笃敬。”心无不尽之谓忠，言无不实之谓信，忠信者，诚也。王阳明日：“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乱其心哉。”求是者，真也。《书》曰：“业广惟勤。”韩昌黎曰：“博爱之谓仁。”本校之校训“诚、真、勤、仁”，诸君闻之稔矣。离校后幸毋忘之。<sup>①</sup>

按照陈裕光的解释，可以看出：忠信谓诚，求是谓真，业广谓勤，博爱谓仁。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金大的校训是最早见诸文字的提法。但据金大校友回忆说，他们二、三十年代在金大念书时就常常听到陈裕光校长讲“诚、真、勤、仁”。可见该校校训在立案之初便可能确立，只是当时未刻意加以宣传罢了。

### （三）燕京大学校训的拟定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基督教新教在我国北京设立一所的教会大学。其前身，是创建于1869年潞河书院和1870年的汇文学校。到19世纪末，这两所学校分别发展成为华北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1916年两校合并。1919年燕京大学正式成立，司徒雷登为第一任校长。学校的英文名称初为“北京大学”，后因与当时著名的国立北京大学的英文名称相同，故改名为“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上任后，对学校进行了改革，首先为学校正名，结束了校名之争。紧接着，司徒雷登又与两位教师郭查理和傅晨光商量，准备为学校制定一个校训。他们三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有着较为一致的办学思想。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大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他们希望所制定的校训不仅仅用来装点门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燕京的办学宗旨，成为激励学生和校友们的精神力量。<sup>②</sup> 他们三人的共同意向是，选用《圣经》中的精彩格言作为校训。郭查理和傅晨光两人中，有一人主张用耶稣所说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司徒雷登认为，这与大学教育毕竟有些隔膜，于是他回想起刻在弗吉尼亚大学正门上方的一句希腊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这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书写在该校的校门正上方。这句话，也同样刻写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大门的上方。他们经商议后认为，这两句话似乎都表达了燕京大学的办学宗旨和办学精神，于是就很自然地想到将两者结合起来。就这样，“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英文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被定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其后该校训分别用中文和英文书写在校门上方。

<sup>①</sup>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sup>②</sup> [美]艾德敦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 三、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知名教会大学的主办者在各自的校训中注入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将无限的希望浓缩于有限的词语中，寓无形的精神价值于具体的要求之上。校训拟定后，在各自校训原则和精神的指导下，三所知名教会大学在课程、师资、生源、校园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一) 圣约翰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也是为数不多的独宗创办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不仅是美国圣公会整个差会在中国的教育中心，也是该会的传教中心。圣约翰大学早期的英文校训“光和真理”，明显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因此，除学生大部分是基督徒外，早期圣约翰大学的课程设置、教师选聘、校园文化等方面无不是从西方教派（或教会）大学移植过来。这些西方大学制度相对于中国传统的旧教育来讲，无疑具有先进性。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圣约翰从一个倍受冷落的洋学堂发展成为学子趋之若鹜、蜚声中土的名校。收回教育权运动后，该校又制定了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从校训可以看出，圣约翰大学仍然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中文校训拟定后，在课程、师资、校园生活等方面均有所改变，现予以分述。

第一，课程的变化。为了有效地传播“光和真理”，圣约翰大学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从1895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早年，圣约翰大学与其它的教会大学一样，也是实行强制性的宗教课程。有所不同的是，为了将优秀的中国青年吸引到学校中来，圣约翰大学的课程除了宗教和中国经典课外，还有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医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涉及声、光、化、电、天文、动植物等诸多科学知识。这样，自然科学很早成为圣约翰大学课程的重要部分。圣约翰大学对英语教学非常重视，其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课，已基本上用英语教授。学生入学的英文考试，用的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入学考试同样的试卷。学校几乎所有的章程、规则、通告、往来公函、会议记录、年度报告等均使用英文，形成十分独特的英语环境。学生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学习，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这种教学模式与双语教学模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对学生语言的掌握和以后从政、从商以及进行其它国际间交往都是很有益处的。在新的校训确立后，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而科学、英语等优势课程则得以进一步强化。

第二，师资的变化。校训“光和真理”是卜舛济借用的是美国著名教会大学——耶鲁大学的校训，他希望日后圣约翰大学也能象耶鲁大学一样成为世界著名的学府。他认为：建设知名的教会大学，首先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因此非常重视教师队



伍的建设。从 20 世纪初开始，他就逐步调整教师结构，将那些不称职的教师清理出学校。1912 年规定，只有那些具有 3 年以上教龄和拥有硕士学位者，才能受聘为教授。1926 年，又进一步将教师分为 6 个等级，即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助教、讲师、助理讲师，每一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资质和学历要求。而在此前，任何在校的西籍教师都能冠以教授头衔。经过多年的努力，圣约翰大学拥有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据统计，在 1936 至 1937 学年，圣约翰文理学院总共有教员 54 名，其中 10 人拥有博士学位，16 人拥有硕士学位。<sup>①</sup> 在新的校训确立后，除教师的资质有了明显的提升外，另一重大变化则是华籍教师所占比例也有了较大提高。

第三，学生的变化。从校训看，圣约翰大学是将传教放在第一位，教育放在第二位的。因此，圣约翰大学早期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偏重宗教性，在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新的校训确立以后，一方面学校拓宽了培养目标，用广义的文理科教育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另一方面，建立严格的入学考试制度，加强对学生的选择。随着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和名声日起，以及由于缺乏教会更多的援助而不得不提高学费，使得它不再偏重于向宗教家庭的子弟开放，而开始向绅商市民阶层全面开放。据统计，其后商人子弟开始占据该校学生的半壁江山。<sup>②</sup> 圣约翰大学学生中教徒比例，也一直呈下降趋势。20 世纪初，教徒占全部学生数的 1/3；30 年代降至 1/4；40 年代末就只有不到 1/5。<sup>③</sup> 从该校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来看，自新校训确立后，从事牧师或宗教事业者，更是日渐式微。

第四，校园生活的变化。在新校训的极力倡导下，圣约翰大学校园内充盈着富有温情意识的、与中国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师道尊严”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非常亲密、融洽、平等，而且，学生们还通过创建各种组织等，来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既促进了身心的全面发展，又为彼此互相接触与交流搭建了平台。在卜舛济看来，基督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一种人生哲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指导和约束个人行为的精神力量。因此，他十分强调教师的人格表率，注重学校生活氛围的营造，并努力创造融洽的师师、师生关系，使他们获得基督教精神的熏陶。他自己在这方面首先以身作则。每逢周末，他总是在家举办晚会，请学生轮流到家里做客。他也要求其他教师多与学生接触，特别是在学生遇到困难时，他每每能给予同情和忠告。这一点非常具有亲和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学校、教师和同学，继而热爱学习的良好风气。在教师之间，他规定，彼此都只以先生相称，不得用校长、教授、博士等职称或学衔。开教师会议时，会上非常民

<sup>①</sup>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6 页。

<sup>②</sup> 黄新宪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8 页。



主，大家都可自由发表意见。对住在校内住宅的教职员，他规定按期赠送盆花（学校自种的）；对新婚的教师，则购买礼品表示祝贺。圣约翰大学的校园生活，对师生的人格塑造和精神陶养有重要影响。

## （二）金陵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虽然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由陈裕光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但在抗战期间，学校在华西坝艰苦办学时，陈裕光曾由衷感言：“吾校精神之养成。盖因本校五十余年校训。”可见，金陵大学的校训在行诸文字之前，就早已存在。另据金大校友回忆，他们二、三十年代在金大念书时，就经常听到陈裕光校长讲诚、真、勤、仁。因此金大校训拟定后的变化，可以看作收回教育权运动后陈裕光任校长时学校所发生的变化。该校在课程、师资、学生和校园生活方面的变化可分述如下。

第一，课程的变化。金陵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其办学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教人格”。学校创立初期，宗教气息十分浓厚，宗教仪式十分严格，宗教课为必修课。金大之课程设置，偏重于西洋科学与文化，尤重英语。金陵大学一年级新生的入学考试，仅英文一项，就要过 5 道关：听力、读力、作文、语法、字量（常见字的字义及用法）。除国文、中国医史等课程不得使用中文以外，其他课程包括文娱活动，都要求采用英文。陈裕光上任后，庄严承诺：金大将“按国内情形，与时代之精神，社会急切之需要，切实培养人才”。他认为：应打通学科界限，反对高等教育过度部门化与僵硬性，强调教育的整体性。主张“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伟闳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吾国固有之文化更臻完备”。秉此方针，他将宗教课改为选修，宗教活动采取自愿的原则，并按照“诚、真、勤、仁”的精神，加强了中文、地理、历史的教学，强调要学好中文。同时开设了经济学、国文、英语、哲学、社会学、化学工程、电机工程、农业经济、农艺学、植物学、动物学、森林、园艺、乡村教育等课程，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了中西兼顾的特点。

第二，师资的变化。金大同其它教会大学一样，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学校师资水平并不是很高，教师队伍也不是很稳定。陈裕光任校长后，加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招揽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使金大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在农科方面。为了鼓励教师多出成果，激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加入金大，金大参照国民政府的“部聘教授”制，在金大设立“讲座教授”，用来奖励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且对于所任学科有特殊贡献的教师。“讲座教授”制激发了教师专心教学、潜心科研的热情，提高了师资水平，也从而稳定了教师队伍，保证了培养质量。



第三,学生的变化。早期金大的学生,主要来源于基督教中学或基督徒的子女,大部分学生是基督徒。收回教育权后,学生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学生来源于富家子弟且多数不是基督徒。金大不同于其它的教会大学的做法是,特别注重吸收乡村学生及基层工作人员,尤其在农学院更是这样。金大极力主张“农村教育,应拿‘农’做事业,应拿‘村’做中心”,“不但要施行普通的教育,并且要担负改良农业的责任。”<sup>①</sup>

第四,校园生活的变化。在校训“诚、真、勤、仁”的倡导和影响下,该校努力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旧教育的新型校风和学校精神,金大师生把校训所代表的精神概括为“金大精神”。多年来,金大以诚为本,唯真是求,勤勉执着,仁爱为怀,从而逐步形成“亲爱精诚,一团和气”和“金陵一家亲”的美好传统。陈裕光更是以令人心悦诚服的诚真勤仁的人格魅力,赢得了“金陵一家”之“家长”的尊称。金大通过亲密和谐的师生关系、中西结合的校园文化、丰富多彩的课余公益活动等潜移默化的方式,将爱撒播在每个人的心田。长期学习、生活在这种充满仁爱的校园中,“学校等于家庭,师长同学情同叔伯兄妹”,“师生老幼,休戚相关,苦乐与共”,“亲爱之情,盎然司溢”<sup>②</sup>,从而使校园充满了家庭生活的温馨。

### (三) 燕京大学校训拟定后的变化

燕京大学“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拟定后,分别用中、英文书写悬挂在校门的正上方,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司徒雷登后来回忆所说“这一校训很快应用于学校的各个方面。”师生每天进出校园,看到校训,倍受鼓舞。“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着师生用科学的方法对真理和自由进行执着追求,通过实地研究来服务社会。在校训原则和精神的指导下,学校在课程、师资、生源和校园生活等方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课程的变化。燕京大学是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一所教会大学,建校之初,学校的宗教气氛特别浓,宗教课为必修课且比重很大,学生必须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校训拟定后,在“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指导下,首先改革了宗教课程,将宗教课程由必修课程改为选修课程。1922年学校废除了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了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时间。1925年,教育部公布《私立学校立案条例》以后,燕大又将宗教课改为选修,不再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认定信仰宗教是学生个人的事。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说:“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作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

<sup>①</sup>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页。

<sup>②</sup>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私事。”1927年,还把原设的宗教学院在名义上与燕大分开。其次,改变课程结构。以主修科、副修科和选修科代替规定的科目制,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西方语言和文学列为主修科,加强科学实验,使学生的基础知识面得以加宽。最后,突出英语的重要地位,用英语进行教学。课程的变化,预示燕大的学校工作由原来“以宗教为主,教学为辅”,转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燕大的发展,从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从而使燕大这所教会大学走上世俗化和正规化的道路。

第二,师资的变化。燕大校训中“因真理得自由”明确指出,燕大是探求和发现真理的地方,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场所。而真理的探求和学术的研究,离不开高水平的教师,所以学校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师资水平的提高。司徒雷登1919年到燕大时,燕大共有25名外籍教师,4名中国籍教师。在这25名外籍教师中,只有司徒雷登有博士学位,还是神学博士。其他教师由资助差会作为传教士派出,都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水平。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进行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和师资水平的提高。他首先向托事部提出:改变所有教师由各差会委派的旧例,给学校一定的自主权,自行聘任他们认为有资格的教师。这一要求虽被托事部驳回,但司徒雷登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不是传教士而有资格和能力任教的西籍教师来燕大工作提供方便。到20世纪20年代末,燕大28名西籍专职教师中,有10余个与差会无直接关系者,由学校支付工资。<sup>①</sup>随着学校中国籍教师的人数增加,他们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为了吸引有名望、有声誉的中国学者来燕大工作,司徒雷登在燕大实行中西籍教职员待遇均等的规定。这与其他教会大学有着显著的不同,极大地调动了中国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1928至1929年度在燕大工作的56位教授级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有20位在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余15位都取得了硕士学位,另有一位是在旧科举制中取得高级地位的进士。<sup>②</sup>到1934年,燕大已经有正副教授111名,且多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或学者。此外,又与国内外的知名大学合作办学、创办新专业,通过互换教师、相互培养研究生等措施来提高师资水平和科研水平。

第三,学生的变化。合并成燕京大学之前的几所教会学校的学生,要么来自基督徒家庭,要么来自基督中学,一般都有明显的宗教背景,学生中的基督徒的比例

<sup>①</sup> 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页。

<sup>②</sup>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郑庭椿译自《燕大年刊1928—1929》,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特别高。由于这一时期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教会工作人员，学生读书靠教会资助，毕业以后供职教会。因此，学校对学生素质的要求偏重宗教性。燕京大学在建校之初，曾以“收费最低”作为自己宣传广告中重要的一条，拓宽了培养对象。20年代后，随着燕大的发展和名声日起，以及学校由于缺乏教会援助而不得不提高学费，使得它越来越向贵族化发展。到了30年代初，学费已增到80元；1937年，又增加到110元。在当时的高等院校中，燕京大学的学费算是很高的了。<sup>①</sup> 史静寰教授于1989年4月向参加纪念燕京大学建校70周年的返校校友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燕京大学60%的学生来自工、商、军、政或其它专业人员家庭。<sup>②</sup>

第四，校园生活的变化。燕京大学的校园生活自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拟定后，就努力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旧教育的新型校风和学校精神，燕大师生把校训所代表的精神概括为“燕京精神”。至于什么是“燕京精神”，燕大师生认为很难用语言把它说清楚。燕大社会学系的许仕廉博士将“燕京精神”概括为：“中国文化和政治思想的中心——学术自由，通过科学方法和基督教精神和教义追求真理，以及通过国际合作平等和强调实地研究所表现的服务。”<sup>③</sup> 燕大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写道：

这一校训非常有力地激励着校园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每一名教师和职员，每一名学生和工人。在每一个既需要个人行动和又需要合作决定的情况下，自由、真理、服务，这三个词，就像一束束光芒照耀着我们。在每一个危难时刻，这些理想又会出现在显赫的地方，给我们以创造性的指引。人们还能十分清晰地回想起那些震动整个校园的历史时刻，例如，1926年3月魏女士被段祺瑞残暴的士兵杀害的时候，1931年日本偷袭山海关的时候，燕京在华西大学校园重新安定下来的时候。人们还能清晰地回想起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2月那些紧张日子里表现出来的忠诚精神，……，完全可以说，在每一个受到这些崇高理想鼓舞的人心中，至今都还深藏着这些激动人心的宗旨。<sup>④</sup>

可见，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与学校的每一个人、每一件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校训所代表的精神，已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与大家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

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是燕京大学校训所倡导的新型校风和学校精神重要体现。每年开学的时候，学校都要组织浓重的迎新仪式，校长、教务长亲自与每一位新生握手、交谈，使新生一入校就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心和重视。燕京大学校长

<sup>①</sup> 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sup>②</sup> 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sup>③</sup> [美]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sup>④</sup> [美]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页。



司徒雷登，还常常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与师生员工建立起一种极具凝聚力的感情。据在燕大读过书的冰心回忆：“你添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信、短筒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那来的。”<sup>①</sup>

---

<sup>①</sup> 转引自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 四、知名教会大学校训与拟定者的教育思想

由校训的涵义我们知道，大学校训是大学主办者通过简短的语句来表达对求学者的期望和要求，反映了学校主办者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体现了该校的特有精神。因此，大学校训的提出，与校训拟定者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校训拟定者的教育思想是制定校训的基础，校训体现拟定者的教育思想。从三所知名教会大学校训内涵中，可以看出校训集中反映了拟定者各自的教育思想。

### （一）圣约翰大学校训与卜舫济的教育思想

圣约翰大学最初只有英文校训“Light and Truth”（“光和真理”），卜舫济借用美国著名教会大学——耶鲁大学的校训，其目的是想让圣约翰大学日后也能象耶鲁大学一样成为名满天下的高等学府。英文校训“光和真理”中的“光”指的是“基督教之光明”，卜舫济认为要使中国皈依基督教，就必须通过教会大学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各类精英人才，来控制中国的上层社会，更好地传播“光和真理”。同时精英人才象光一样照亮其他的人，从而影响其他的人，达到中国基督化的目的。因此，校训“光和真理”首先反映的是卜舫济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

其一，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

圣约翰大学英文校训的“光”，指的是“基督教之光明”。如何传播基督教的光明，卜舫济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创办知名教会大学，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到学校学习，根据教会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社会的精英，从而控制中国上层社会，借此来传播基督教之光明，最终达到中国基督化的目的。

卜舫济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是对在当时教会教育和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认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卜舫济来到中国时，正值教会直接传教、布道遇挫后，一部分传教士开始转变方式，试图通过教育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传播上帝的福音”，把教育作为提高传教的功效和质量，改善差会形象的手段，且取得一定功效。他看到，教会学校在实践中获得了发展的生命力，觉得应该强调学校教育的学术标准，应该考虑怎样提高学校水平以扩大影响。同时卜舫济也注意到，没落的清王朝急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改革势必需要各种新式精英人才。他还认为，中国正处在一段长时间的转变时期，基督教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塑造未来，最好能为中国培养社会精英，从而控制中国上层社会，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卜舫济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与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狄考文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在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狄考文具体说明了必须培训新的知



识分子以代替中国固有的士大夫阶级，借以取得统治地位的传教思路。他在大会上说：“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就中国来说，比其他异教的国家更真实。作为儒学思想的支柱是受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级。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能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sup>①</sup> 卜舫济非常赞同狄考文观点。他认为，要取得统治地位，就要培养社会精英人才，要培养社会精英人才；就要创办知名的教会大学，把中国优秀的青年吸引到教会大学来，经过教育和训练，使他们成为社会的精英。至于怎样与为什么要创办知名教会大学，卜舫济在那次大会作了著名的“西点军校”的发言。他说：

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立在中国的西点军校……当被问到美国军队的力量来自何处时，我们不只是指出我们有少量的常规军，而是提到西点军校，那里训练着我们未来的军官和军人，准备一旦需要就可担任领袖，对别人进行激励和训练。当被问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何处可以清楚看出其力量来源时，让我们不单单指出中国有那么一小队英勇的本地和外国的福音传道人，而且我们还应指出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本国同胞施加最巨大和最有力的影响。<sup>②</sup>

大家都知道，西点军校是美国的一所举世闻名的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素有“美国将军的摇篮”的美称。卜舫济有关“西点军校”的发言，正是他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的体现。

后来，卜舫济在研究有名的传教士圣保罗的生平时惊奇地发现，圣保罗几乎没有向异教徒作直接宣教。这使他更相信：“上帝使学校成为影响中国最有效的手段。”也使他更坚定了将圣约翰大学办成著名的教会大学的决心。正如他写道：“有朝一日，我们在此建立一所伟大的教会学府”<sup>③</sup>，来实现他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于是，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知名的教会大学，培养中国社会发展急需的各种精英人才以控制中国未来的发展，就成了卜舫济最先重点考虑的方向。为了把圣约翰书院升格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知名的大学，来实现他培养社会精英的教育思想，卜舫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卜舫济仿照美国模式在圣约翰书院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开始正规的大学教育，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圣约翰大学在教育制度上系统地模仿西方大学，尤

<sup>①</sup> 王神萌：《齐鲁大学校史简介》，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sup>②</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sup>③</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其是美国的大学，采用了诸如考试名誉制、选科制、学分制、导师制、割制等制度。在卜舫济的主持下，从 1895 年起，学校正式开设大学课程，并且将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学科教授。1896 年，学校形成文理科、医科、神学科及预科的教学格局。1905 年，学校成为正式的大学，并依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条例》在美国注册，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四所大学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成为最早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大学之一。卜舫济认为，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一是可以提高学校的声望；二是借颁发学位以提高学校的水准；三是可为学生出国深造创造条件。

注重特色、以质取胜。圣约翰大学很早就名声鹊起，赢得国人的认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卜舫济注重特色、追求质量的办学措施。偏重英语教学是圣约翰大学早期迅速获得声望的主要手段，也可以说，圣约翰大学是靠英语起家的。圣约翰大学地处当时最商业化和西方色彩最强烈的上海，英语在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商业和获得机会的语言，英语技能也逐渐发展成一种职业技能。卜舫济在 1887 年给圣公会布道部的报告中，阐述了用英语教学的益处和重要性：（1）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2）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3）华人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方之间的接触。占据商界重要地位；（4）华人研究英文，可明了基督教事业和教义；（5）华人研究英文，至少在通商口岸，已势在必行，教会学校应捷足先登。<sup>①</sup> 因此，圣约翰大学对英语教学非常重视。自 20 世纪初以来，其全部课程，包括中国历史课，已基本上用英语教授。

以质取胜历来受到卜舫济的重视。卜舫济认为，学校不应关心学生人数的增长，而应关注教学质量的提高，关心师资水准的提高和教学设施的完善。1936 年卜舫济休完长假回到圣约翰大学后，发现学生人数出乎意料地增多了。为此，他并不感到高兴。他写道：“.....在以后的招生中，我们必须严格挑选，对入学学生的活动也要严加监管。圣约翰大学没有必要以学生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与否。圣约翰大学的主要目标一直是，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基督徒的品质和健全的智力。”<sup>②</sup>

其二，注重科学的教育思想。

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光和真理”中的“真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基督教之真理；其二是指科学之真理。卜舫济认为，追求科学的真理有助于对基督教真理的理解，二者并不矛盾，所以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的传授。卜舫济注重科学的教育思想，是在对当时中国社会变化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卜舫济看到中

<sup>①</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 页。

<sup>②</sup> [美] 贾玛丽著，王东波译：《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2 页。



国传统社会将儒家思想当作是正宗，除义理、考据、词章外，很少有其它的科学知识，科举入仕成学生为白首到老终不悔的唯一支撑点。卜舫济看到，不管是夏日炎炎，还是数九寒冬，中国学生都要死读儒家经典，没有假期，不能玩耍，他认为，这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对此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主张，应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授和科学方法的训练，为基督教在中国培养人才。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在被动打开国门后，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社会中新的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发展，需要通过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和具有一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生产者。卜舫济想迎合中国的国情，利用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心理，在圣约翰大学教授科学知识，为中国社会培养所需的人才。他非常赞同另一位传教士狄考文的观点：“如果虔诚的基督徒不准备控制和指导这场变革的话，它就会被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学艺术和物质的提高将落入基督教敌人的手中，被他们用来作为阻碍真理和正义发展的强大武器。科学不是成为宗教的盟友，就是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基督教会的良机就在于培养能以基督教真理来领导这场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变革的人才。”应使“西方科学文明迅速在中国生根开花”<sup>①</sup>，用“基督教真理”来培养能“控制”中国发展的人才。1890年，卜舫济在一份报告中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对理解上帝的统一性和启示是很重要的……科学训练是迷信的敌人，而且是一个人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智力训练形式。”<sup>②</sup>同时卜舫济还认为，那些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必定要学习、引进的，即使传教士不这么做，中国也会通过其它途径获得。所以，圣约翰大学的课程除了宗教和中国经典课外，还有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医学、心理学、逻辑学等，涉及声、光、化、电、天文、动植物等诸多科学知识。这样自然科学很早成为圣约翰大学课程的重要部分。这些课程，对学生增长才干、开拓视野、了解世界，以及以后走向社会、谋生均有现实意义。

其三，“宣教性”的宗教教育思想。

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孔子的名言，讲的是做学问的方法，要学思结合。卜舫济认为，这句格言对理解和传播基督教教义有帮助，且不影响学校的宗教目的。此后，中文校训便和英文校训“光和真理”结合起来，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传教。不过，为基督教服务的宗旨开始披上儒学的外衣。圣约翰大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卜舫济“宣教性”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实践。

<sup>①</sup> [美]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sup>②</sup> [美]芳卫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卜舫济认为，教会大学应直接为教会教育服务，培养本地教徒和牧师是圣约翰大学的最高目的之一。教会大学主要目标一直是而且也应该是培养学生基督教的品质和健全的智力。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前，圣约翰大学同其它的教会大学一样，实行的是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不论信教与否，都必须参加包括查经和礼拜在内的宗教活动。卜舫济更是强制性宗教教育的极力倡导者与实践者。他曾发表言论，对强制性的宗教活动进行系统辩护：首先，圣约翰的礼拜和宗教教育虽属强制，但学生入学却并非强制的，完全取决于学生本人和家长的自由选择；第二，宗教仪式虽然强迫学生参加，但学生是否参加基督教，则听由他们自决；第三，中国的情形与督教国家有很大区别，英、美一些大学实行“自愿参与”原则，但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仍有大量机会接触基督教，而中国学生则无此可能，教外学生如不参加宗教活动，便与基督教文化绝缘；第四，教会学校作为有教徒支持的私立学校与由税收支持的国立学校有本质区别，要求学生参加基督教在前者是正当的，在后者才是违背宗教信仰自由。<sup>①</sup>说白了，卜舫济认为，圣约翰大学是宣教的间接工具，是直接为教会服务的。

卜舫济由于坚持“宣教性”的教育思想，片面强调基督化，因而使圣约翰大学逐渐偏离中国化的道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和教会内部改革宗教教育的压力下，圣约翰大学于 1925 年实现所谓的双轨制，规定未入教的学生可以在做礼拜和新开设的伦理课（实际也是宗教课）之间作一选择。但双轨制的实施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大多数学生对伦理课和教堂做礼拜均无多大兴趣。在向中国政府立案问题上，圣约翰大学之所以采取抵制态度，也与卜舫济坚持“宣教性”的宗教教育思想有密切关系。到 1931 年，除圣约翰大学外，其他教会大学都已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手续，圣约翰大学成了唯一一所游离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教会大学。虽然卜舫济后来在立案问题上的态度有所转变，认为立案是学校的必然选择，但学校直到 1948 年才被批准立案。作为长时间未立案学校，圣约翰大学不仅未获得政府的任何津贴，而且还面临许多障碍，如不能像其他学校一样获进口物品免税的优惠，圣约翰学生也不被允许参加政府公务员考试和公费留学考试等。由于拒绝向中国政府立案，圣约翰大学不仅受到其他学校的孤立，同时也受到了在校学生以及校友的指责，圣约翰大学的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其在精神、物质上获得的援助也日益减少。可见，正是过分强调学校的宗教性而未向中国政府立案，是导致圣约翰大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

<sup>①</sup> 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192 页。



## （二）金陵大学校训与陈裕光的教育思想

从上文有关金陵大学校训拟定过程的介绍可知，“诚、真、勤、仁”由校长陈裕光在 40 年代初期正式提出，但依此办学，却是他在接任校长之初，所以说，这集中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陈裕光在提出校训的《校长训词》讲道：“盖现今之大学教育为一躯壳，而坚强之意志、苦干之精神，与夫真诚勤仁之行动为其灵魂；躯壳与灵魂兼备，而后大学教育始称完善。”<sup>①</sup>认为坚强的意志、苦干的精神和真诚勤仁的行动为大学教育的灵魂，又认为，只有灵魂才能赋予躯壳以生命。而在意志、精神和行动这三者中，诚真勤仁的行动是最为重要的。应该说“诚真勤仁”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陈裕光把它们看作行动的指南并作为金陵大学的校训，充分体现了他爱国主义、重视科学、学以致用、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以下予以分述。

其一，爱国主义的教育思想。

陈裕光将“诚”字放在首位的原因，按照陈裕光在《赠本届毕业同学》中的解释，忠信谓诚。陈裕光认为对国家、对人民、对学习均应以“诚”为本，也就是要对国家忠诚，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诚实守信，要诚心向学，要发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中所提出“八条目”中，“诚”字便居于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道德修养的步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裕光所强调的“诚”，无疑与“诚意”的精神相通。

“诚”首先要求对国家忠诚，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诚实守信。多年来，陈裕光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1928 年 5 月 3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军民万余人，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三惨案”。消息传到南京，群情激愤，金大学生纷纷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陈裕光亲自主持全体教职员大会，成立了“金陵大学教职员反日救国大会”，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崇尚韬光养晦、行事谨慎的陈裕光，一反温文儒雅的态度，神情激愤地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庄严地举起右手，大声领读《永不使用日货》的誓词：“金陵大学师生以复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sup>②</sup>陈裕光本人对此誓言恪守不渝，坚持了整整一个甲子，使之真正成为了“终我一生”的誓言。1934 年，日本驻南京公使馆在鼓楼百步坡竖立一座钢架式旗杆，悬挂太阳旗。师生见到太阳旗高过金大校园内的国旗，异常气愤，自

<sup>①</sup>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9 页。

<sup>②</sup>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 年第 2 期。



发筹款，师生热烈响应，陈校长积极支持。于第二年8月在大礼堂南侧建立起了一座钢管式旗杆。新旗杆高出日本旗杆10尺，以“镇其邪气”。国旗在蓝天白云中飘扬，表达了金大全体师生的爱国之情、忠诚之心。

其次，“诚”要求诚心向学。陈裕光认为，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管是办学的人，还是教学的人，或是求学的人，最重要的是要诚心向学。办学的，要诚心向学，即以办教育为职志，为己任；当先生的，要诚心教学，不仅自己要有学问，而且要醉心于研究学问，潜心于传授学术；当学生的，也要诚心求学，即不仅要“会念书”，而且要学会做学问，在校期间就要养成研究学问的风气。只有大家都诚心向学，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在陈裕光看来，对事业的追求和对名利的淡薄，是诚心向学的具体体现，因而十分提倡，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楷模。在他影响下，金大有许多教授，如农学院王绶等人，把孟子的“三乐”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人生有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乐一也；著书立说，流芳百世，其乐二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其乐三也。”王教授等人的三乐，乃真正金大人的道德风范。对金大教授这样“淡泊之气概”，福开森非常欣赏，他曾在对金大同学的一次演讲中谈到：“此气概非消极之表示，实含人生生活中至高尚之意味”，认为“东方优美文化多由此产生”。也正因为如此，在金大德行高尚、诚心向学的人，最受人尊敬。金大的教员鲜有攀龙附凤、追逐名利之辈，学生中也极少见拿学问做进入豪门的敲门砖，拿文凭做仕途的通行证。

最后，要发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立案前，金大之课程除宗教外，偏重于西洋科学和文化。日常教学用语，除国文和历史用汉语教学外，都用英语。文娱活动场所，实验室内，运动场上，甚至学生助威的啦啦队亦不例外。然而，陈裕光认为，西方近代科学比我国发达，这是事实。但是，中国大学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必须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一切精神、物质文明的总积累，要看重祖国固有文化，尊重祖国固有的立国精神，不能随便抛弃而毫无顾惜；外来文化，不能不加择别地随便模仿，甚至全部西化。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能只是名、目、肤色是中国人，而思想、精神、情感、品德不是中国人。他身体力行，他的英语很好，但在家中讲宁波话（祖籍宁波），在外面讲普通话，在讲话中亦从不夹用英语。穿戴上，布衣布鞋，或长衫，或长袍马褂，在金大20多年，从未穿过西装革履。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语言，风俗，文化等方面）。每年秋季，华东四大学的英语比赛，其他学校的学生总是西装革履，而金大的学生，则一律长袍马褂，一口流利的英语，一身学者的打扮，看起来似乎不太协调，但却给人以深刻的中国学者的印象。



其二，重视科学的教育思想。

“真”就是求是，也就是崇真求实。这是金大人办学、治学、求学中一以贯之的科学目标、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体现了陈裕光重视科学的教育思想。陈裕光早年就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所以对科学特别重视。他认为，科学有两条线路：一为纯粹之科学研究，其目的在求真，为科学而科学，以发现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原则与事实为指归；二为应用科学，其目的在运用科学而有所发现，以充实人类生活，也就是求实。因此，大学是探求、发现真理的地方，离开了科学研究，便不能称其为大学。在他看来，重视科学首先要重视科学实践，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其次要注意为科学研究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

重视科学实践，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陈裕光认为，研究科学的人，首先要有求真的精神，要注重科学精神的培养，要重视科学实践，要做到“不偏见、不固执、不苟合、不盲从，而使真理永得照彻天地间”<sup>①</sup>。因此，在他执掌金大校政期间，特别重视科学实践，强调科学精神的培养，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例，为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该院农业专修科采取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科学训练。在入学考试科目中设有翻地、挑粪等农事操作测验，以期培养出“具有先进农业科学知识和农民身手、热心农村建设的青年农业工作者”<sup>②</sup>。农业经济系也有类似的规定，凡“读满3年之学生，必须自选题目，拟制表格，利用暑假时期，实地下乡调查，分析统计均亲为之，盖所以训练认识环境，具有观察客观环境之能力，以成他日有用之才”。<sup>③</sup>农业经济系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1923~1924年，发表《中国安徽芜湖近郊102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对此芮思娄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所有重视农业及农村者长久以来对中国农业及农村生活的诸多真相皆感需要，可是，愈是真实的愈难掌握，但正确了解实际情况作为改进的依据是绝对必要的，为解决此项问题，以科学的农场管理及对所有调查资料经过严密的查对，在调查设计及资料搜集方面，卜凯教授作为长老会农业使团成员在南宿州农村的经验极有价值。这项调查是可靠的，皆在卜凯指导下全由其学生来调查……”。<sup>④</sup>此后，农业经济系的师生进行了众多的调查，尤其是在物价方面，这些调查所记录的详尽资料，对当时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使金大农业经济系成为30年代蜚声中外的物价研究单位。农村调查课，不仅教给了学生科学文化知识、读书和工作的方法，尤为重要的是，培

<sup>①</sup> 转引自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sup>②</sup>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sup>③</sup>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sup>④</sup> 殷晓岚：《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73页。



养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与刻苦学习、认真负责、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注意为科学研究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陈裕光非常清楚，要想多出科研成果，必须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正如他所言：“专家之产生，又需学术的环境。”因此他多方筹措资金，购置仪器、设备、改建新建实验室。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金大拥有较为完善的化学实验室、充足的生物学设备和符合当时标准的物理研究设备。为了使学术研究不受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干扰，他常常鼓励师生要敢于发表公正的言论。在陈裕光的领导下，金大的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1934 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金大与其他国际间之大学同等学术地位，并能自行颁发学士和硕士学位。金大虽然取得了这样骄人的学术成就、地位和声誉，但金大校训却时刻告诫师生在求学、治学、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定要“崇真尚实”，即要有“定见”，切不可“唯时是趋”，存“炫异之心”。

其三，学以致用教育思想。

“勤”，业广谓勤。陈裕光对于《尚书》所言“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思想极为赞同。他常对学生说：“古人云：‘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勤就是实干，就是‘起而行’。”<sup>①</sup>他还认为：“学以致用是我国先儒的一贯的说法，本校也素常注意这一点。”<sup>②</sup>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人才，但不需要只会空谈的人；学问是要用的，用了才有效果。因此，校训中的“勤”，体现的是学以致用教育思想。陈裕光认为，劳作教育和社会服务是贯彻学以致用教育思想的有效途径。

开展劳作教育。金大的学生不仅要求要学好书本知识，还要求走出校园，参加劳作课程。如农科学生要从事田间林野之活动，文科学生要参加社会调查，理科学生要体验生产实践，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劳动，要学以致用。为训练学生的服务能力，养成劳动习惯，学校对勤工俭学极为提倡，在校中不少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打钟的有同学，办公室做职员的有同学，图书馆做管理员的也有同学。刚进校的新同学每每初以为奇，“但习之既久，渐渐也被同化，挑砖搬瓦，都能自任其劳”<sup>③</sup>。

重视社会服务。金大办学非常重视社会服务和社会实践，科研、教学、人才培养，均极关注社会的需求。当年金大最有特色且在国内最享盛誉的学科是农科。而金大农学院的创办宗旨为：“授予青年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物的改良 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夫农民生活程度之提高。”<sup>④</sup>为了适应社会需求，金大专门成立农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进行改良和推广良种，培养了大量农业高级专门

<sup>①</sup>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8 页。

<sup>②</sup>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8-299 页。

<sup>③</sup>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9 页。

<sup>④</sup>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6 页。



人才，将高等教育延伸至农村，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34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将乡村建设作为在华投资的重点后，燕京、南开、金陵、岭南等大学纷纷制定了各自计划，并付诸实施。其中，“金陵大学的成就最为显著”。在教学上，陈裕光主张教学工作必须注重实用，要学以致用。当时金大农科从康奈尔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合一制度，简称“三一制”，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并落实到推广应用。陈裕光就将“学以致用”进一步发挥：“大家都重视学与用，‘三一制’体制，其本质就是，边学边用边研究。”当时，金大许多研究都能紧紧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如洛夫是世界一流的作物育种专家；李方训关于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的研究成果发表后，被国外著作《高级物理化学》（T.R.帕廷康主编，1941年）、《电化学现代状况》（L.鲍芮斯主编，1954年）、《电磁学》（W.施尔沃德主编，1956年）等多次引用；还有蔡乐生研究维生素的营养价值和猫鼠共处等科学命题，成为国际闻名的先驱；李卓皓（后去美，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致力于荷尔蒙研究，他先后从脑下腺中发现8种荷尔蒙，是国际公认的生化大师；魏学仁等拍摄了当时世界唯一的日全食彩色电影，并参与开创了中国的教育电影事业（电化教育）。

其四，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仁”，博爱谓仁，要关心、爱护、尊重和帮助他人，要以仁爱为怀，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孔子说过“仁者爱人”。在陈裕光看，来大力提倡、躬身力行并从制度上来培育“仁爱”，是实行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的好方法。因此，特别重视仁爱在教育活动以及学生自身成长过程中的教化和熏陶作用。在金大，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能受到学校特有的仁慈、博爱的气氛的熏陶。金大校园高高耸立的大标语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夺取为目的。”它旨在时时告诫学生：“爱人”就不能“徇私循利，予求予取”，<sup>①</sup>而须关爱他人，服务他人。陈裕光大力提倡在校应关心同学、关心老师、关心同事，陈裕光是这样提倡的，也是这么做的。陈裕光一向爱生如子。如学生灭虫之类的小事，他也会亲自过问，并在全校发起“除虫运动”，确保学生免受蚊虫侵扰，不至影响健康。1945年，陈裕光从美国考察归来，将“旅费撙节所得，购买维它命丸数十磅，携归分赠本校教职员同仁，私人行李因此过重，只好留存美国友人处”<sup>②</sup>。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金大师生无不为其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打动。

<sup>①</sup> 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页。

<sup>②</sup>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第2期。



### (三) 燕京大学校训与司徒雷登的教育思想

司徒雷登在为燕京大学拟定校训前认为教会大学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大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他认为，制定的校训不仅仅用来装点门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燕京的宗旨，成为激励学生和校友们的精神力量。他为燕京大学的拟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英文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集中体现了他追求科学真理，强调学术自由，服务中国社会的教育思想。

其一，追求科学真理的教育思想。

燕大的校训中的“因真理”，指的是科学之真理。司徒雷登认为，大学是探求真理的地方，尤其应该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他把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说：“在试图创办我梦寐以求的大学时，我的任务似乎包括四个方面：传播基督教；提高科学水平，开设专业课程；增进同中国的关系，增进各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开辟经费来源和筹办物资设备。”<sup>①</sup>司徒雷登深深知道，教会大学的未来，取决于它的教育水准和学术水平，要使燕京大学成为他计划中的“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有水平”的大学，必须提高科学水平，自由地探求真理。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将燕大的办学宗旨改为了：“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为宗旨。”同时，把追求科学真理的教育思想应用于学校的方方面面。

首先将学校工作由原来“以宗教为主，教学为辅”转到“以教学为主”的轨道上来。燕京大学是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的，在建校初期，宗教气氛很浓，宗教课是必修课，学生必须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司徒雷登上任后，逐渐减少宗教课，增加自然科学课程。1927年，还把原设的宗教学院在名义上与燕大分开，规定宗教课为选修课，不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认为信仰宗教是学生个人的事。司徒雷登话说：“不应要求学生去教堂作礼拜，或强求他们参加宗教仪式，不应在学业上优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学生，也不要给那些拒绝信教的人制造障碍。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私事。”<sup>②</sup>将学校工作转到“以教学主”预示着司徒雷登教育思想的重大转变，并使燕大获得不断发展的动力，从而使燕大这所教会大学走上世俗化和正规化的进程。

其次，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大力提高师资水平。司徒雷登认为，大学是探求

<sup>①</sup>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sup>②</sup> [美]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和发现真理的地方，真理的探求和发现离不开教师，所以应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师资水平的提高。

最后，重视科学研究和科学实践，注意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燕大自然科学各系，一般都要做实验。上实验课时，不只是看老师做实验，还要求人人亲自动手做实验，写实验报告。报告的格式要求规范，图表数字必须精确，书写也要求美观大方。实验室也有严格的规定。最突出的是，实验数据不得更改，即使是笔误，也需要实验助理员审核签字；所有记录和算稿，都要放在实验报告内。实验课不仅让学生学到了科学知识；还养成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研究精神和态度。

此外，司徒雷登还看重与国内外的知名大学合作办学；创办新专业，通过互换教师、相互培养研究生等措施，来提高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1926年以前的燕大办学条件很差，缺少必要的教学和实验仪器、设备。20年代初，燕大就曾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办学，生物、化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系的学生，可以到协和医学院选课并利用那里的实验室做实验。这一合作，促进了燕大自然科学教学工作的发展，提高了这些学科的水平。另外，社会学系由燕大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创立，并且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系；新闻专业也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使燕大与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合作办学，大大提高了燕大的国学研究水平和燕大在世界学术界的知名度。

其二，强调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

燕京大学校训中的“自由”，体现的是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借鉴西方近代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受西方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司徒雷登在燕大非常强调学术自由并努力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使学校内部有教学、研究、学习的自由。即教师与学生知识进行研究时，可以不受学术以外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的干扰，独立自主地解决学术范围内的问题。因此，校内学术气氛很浓，思想、言论比较自由，允许自由地探索真理并发表见解。正如司徒雷登所说：“它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至于信仰的或表达信仰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sup>①</sup>这使得燕大各种激进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思潮获得了传播的条件。燕大还时常邀请一些中外知名学者到学校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胡适在这里发表过“读书救国”的演讲，梁漱溟在这里不遗余力地鼓吹过“乡村建设”的理论，李达宣讲过“唯物辩证法”，吴晗也在这里揭露过国民党的黑暗。在学

<sup>①</sup>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校里，既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信奉“三民主义”。不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燕大都保持着浓厚而自由的学术气氛，各种思想在这里自由传播，图书馆也可以保证师生借阅到外面被列为禁书的书籍，例如马克思的著作等。

其三，服务中国社会的教育思想，

司徒雷登将“服务社会”这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寓于校训中，给人一份社会责任感，激励着全体师生员工奋发向上。他们以“服务社会”为己任，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奉献精神。在司徒雷登看来，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基督教精神，就要在支持建设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使中国人接受社会服务与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的理想，从而有助于为社会和国家服务。司徒雷登认为，开办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职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与教学、科研、服务相结合，是实现其服务中国社会教育思想的良好途径。

积极开办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型、职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来服务中国社会。司徒雷登认为，应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开设诸如畜牧、工业制革、家政、护理、工业预科、书写书记、新闻等实用型、职业技术型的专业和课程，来服务中国社会。燕大在建校之初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办学时就开设了护士预备班。据司徒雷登回忆，“北京协和医院早就感到需要培养一批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护士，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一个上大学的女孩子去当老妈子那是丢人的。一旦打破了这一观念，我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而且也为中国女孩打开了另一种职业的大门。”而实际上，当时参加报名的人数很快就将名额用完了。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在学校当局的努力下，1927~1928年是燕大职业教育的高峰时期，其学生人数一度达到学生总数的26%。

注重教学、科研、服务相结合。司徒雷登十分重视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并把它们作为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从而服务社会。在教学上，燕大注意引进西方大学的教学标准，注重设置较为齐全的课程，力图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训练，形成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燕京大学要求，学社会科学的学生，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入门课各一门，并允许在这个基础上，自愿选读其它门类的高级课程。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同样必须选修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关课程，以扩大知识面。在具备广博的知识之后，方可用更多的时间学习专业课程。为了保证学生选课的科学性，克服盲目性和随意性，司徒雷登要求，学校每年出版一本《课程一览》，介绍课程的内容、上课时数和学分数，并列出选读高级课程所需的预修课的内容。学生在参考《课程一览》，初步选定自己本年度或学期所要学习的课程后，要面见系主任，由其审查批准。在科学研究方面，燕大在完善系科的同时，增设了一批研



研究机构，除组织专门人员进行研究外，还发动教师和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研究。在重视教学、科研的同时，燕大还十分重视服务工作，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服务中国社会。燕京大学于 1928 年在北京东南的清河镇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于 1930 年正式成立了清河试验区。燕京大学在该试验区内，从经济、社会、卫生等角度，探讨中国农村建设的普遍方法和途径，并获得了一批成果。通过社会服务活动，将这些科研成果投入实践，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提供帮助。燕京大学在 30 年代还曾联合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等单位，投入大批人力在山东济宁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虽然司徒雷登“服务社会”思想的着眼点是宣扬宗教，强调服务与牺牲，是以培养有影响力、能为大众服务并由此引导大众的知识阶层为目标的，但这是传统的宗教目的和新兴的民族意识双重作用的结果。燕京大学在当时算得上是国内一流大学，其毕业生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并不难，但燕大很多学生却当了中学教师，有些学生甚至视中学教师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手段。燕大是一所教会大学，出国的机会很多，然而，出国留学大多是他们所服务机构的一种有目的安排，其目的也是为了回国后更好地服务社会。

其四，“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

教会大学是为传教的目的而设，宗教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文字看，“真理”、“自由”、“服务”都源于《圣经》，其内涵隐含着对基督教的传播；但“真理”、“自由”、“服务”又与科学、学术和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说明司徒雷登是想通过对燕京大学的办理，让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力量，并以社会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单纯的说教布道。可见，司徒雷登实行的是“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

司徒雷登“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宗教观分不开。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跟随作为传教士的父母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儿时亲眼目睹了父亲传教的经历，使他对传统的传教方式有说不出的厌恶。儿时的经历与长大后在美国接受的现代教育，共同促成了司徒雷登与众不同的“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在司徒雷登看来，传教士的任务，是使整个社会认识基督教的力量，并以社会的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不是使个别人成为教徒。因此，教会学校应强调基督教对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的实际效用和精神力量，而不是教人熟读经书，背诵教义，遵守教条。有鉴于此，司徒雷登提出，燕京大学学生宗教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基督化。要达到这个目的，不在于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而是制造一种气氛，使学生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如学生在毕业时能成为教徒固然好，即使没



有接受洗礼，也能对教会有好评，对母校有感情。为此，他力求从宗教课、宗教课教员、校内宗教组织等入手，进行调整和改革。1922年，燕大废除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主日仪式和教堂礼拜的旧习，并缩减了学生必修的宗教课程的时间。1925年以后，燕大又将宗教课改为选修，同时将教授宗教课的教员大幅度削减。1927年，宗教学院从燕大分出去。他要求教员通过“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基督教青年会燕京大学校会”等组织向学生灌输宗教思想，但并不一定要求学生必须当教徒。

在学校生活方面，司徒雷登并不多谈宗教，一年不过偶然讲一两次道，也并不“不得体，反不如他在圣诞节招待儿童时那样胜任愉快”，因为在他看来，燕大追求的是“将耶稣基督的原理和精神运用于学校的共同生活、学术水平以及学校的各项政策和活动中”。为此，司徒雷登以身作则，努力与每一个人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使人们从他的身上获得了对基督徒的直观认识，体现的是现代派传教士“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在他“开放性”的宗教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在燕大“外国人和中国人，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



## 五、对中国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评价

大学不仅是一个传播文化、传授知识的场所，也是一个塑造人格、濡化品性的场所。一所大学的校训，对全校师生的思想品质、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知名教会大学凝练简短而又内涵丰富的校训，明确了对受教育者的要求，可激励师生追求对社会有所贡献，对受教育者人格和品质的塑造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我们也应看到，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也隐含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对当时的中国学生和学生的个人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 （一）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积极影响

第一，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校训所蕴涵的精神，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

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作为一种校园文化，它不可能脱离学校而独立存在，它也会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们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知名教会大学在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其主办人逐渐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了一定了解，他们切实感受到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并开始认真思考大学的前途问题。针对教会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知名教会大学的领导者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做法，作出了政策上的调整。从那时起，知名教会大学开始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学术水平，增强竞争力。同时，也减少了宗教必修课的数量，改革宗教活动方式，提出教会大学也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尽可能减少与学生和中国社会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与冲突。知名教会大学还相应增加了中国教师的比例，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采取了中西学并重的方针，增加了国文课教学比例，广聘名家任教等。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发展所要求的，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较好地处理宗教目的和教育的内在规律二者之间的关系。

知名教会大学是为传教而设的，宗教教育始终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宗教目的，是使中国基督化。而教育的内在规律，是培养掌握高等专业知识的各类人才。<sup>①</sup> 教会大学的宗教目的与教育的内在规律是尖锐对立的。因为西方道德价值观念，很难改变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观点，并且前者常常被后者所利用。从

<sup>①</sup> 谭献民：《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第8页。



校训的变化看,知名教会大学较好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的时候,正是民族主义高涨的“五四”爱国运动即将爆发之时,对燕京大学这样有教会背景和宗教目的的学校发展非常不利。如何使所拟定的校训既保有教会大学的宗教目的,又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而不冒犯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司徒雷登选择了源于《圣经》的“真理”、“自由”、“服务”等名词。其内容隐含着对基督精神的传播,实有宗教目的;但“真理”、“自由”、“服务”又与探求科学真理、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人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圣约翰大学先有来源于《圣经》的英文校训“光和真理”,有明显的宗教目的;后有出自《论语》的中文校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是治学的方法,两个校训同时存在。这样做,既不影响知名教会大学办学的宗教目的,也符合教育的内在规律,即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金陵大学的校训“诚、真、勤、仁”,虽然字面上看都是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品质,但根据陈裕光的阐释,其中也含有基督教教义中的“牺牲”、“服务”、“博爱”等精神。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隐含有宗教目的。

第三,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在发展创新各自的办学理念中,实现对中西高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融合。

早期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突出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偏爱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大多来源于西方的经典著作——《圣经》。这与它们所信奉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校训也不例外;它并不是奇思异想的结果,它的形成和它一贯继承的高等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东西方由于哲学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在教育思想上也有所不同。正如我们所知,西方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那时的高等学府被称为学园,是一些大哲学家和教育家创办的。他们崇尚对真理的追求,培育的多是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当时的学园不仅为西方的高等教育开了先河,而且为后来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然而,学园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大学;直到中世纪,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才真正诞生。而那时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在地方政府和教会之间取得了一种相对的自治权;包括神学都可以在大学里进行自由地探讨和辩论,学者也并不会因此受到迫害。中世纪的大学,大都以教皇或国王的敕令与特许状作为办学的依据,并且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免缴人头税、免服兵役、有停讲权和迁移权等),基督教会成为这些大学成立的最初审批机构与庇护机关。另一方面,中世纪的修道院与寺院是保存书籍和文物的文化中心,许多大学就是在修道院或寺院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神学家、修道士、传教士成为大学建立之初的首批教师。他们不仅教授神学,而且还传播知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世纪的大学几乎伴随着宗教而诞生;大学一经产生,就争取到了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也正是如此,早期知名教会大学继承了西方大学学术自由、学校自治的传统,在高墙后面开始了学术探索和知识传授的



活动；在理念上，他们始终坚持真理至上，尊重科学，维护自治与自由。这也是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内容，总是围绕着科学与真理、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展开的原因。

相比之下，宗教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像西方那么根深蒂固。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高等教育思想，注重德行的养成，注重“道”的获取。但是，那时最为看重的是伦理、道德。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培养和选拔人才，服务于国家。因此，那时对高等学府的定位，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取得官吏资格的机关。宋代书院的兴起，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书院里的教师自由讲学，对学员个别辅导，注重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强调独立思考和对问题的理解，强调知识传授的严肃性，强调对教育者和知识的尊重。书院还邀请其他学派的大师讲学，在师与师生间展开学术辩论，这是以往官学和私学教育中从未出现过的新气象。

知名教会大学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所实施的改革，融合了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思想的优秀成分。知名教会大学要在中国发展，不仅需要继承西方高等教育思想，而且需要从中国固有的高等教育传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所以他们一方面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另一方面也强调道德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爱国情怀和博大的胸襟。这种中西合璧教育思想，使得知名教会大学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第四，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影响着学生性格的培养和形成，激励学生成为优秀人才，从而服务中国社会。

校训，是一所学校的精神与灵魂，反映了学校的办学宗旨，为学校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是师生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校训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对受教育者人格和品质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来看，其校训可代表各自的大学精神，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拟定校训前，希望所制定的校训不仅仅可用来装点门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表达燕京的宗旨，成为激励学生和校友们的精神力量。事实上，“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从确立之日起，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燕大人。燕大师生把校训所代表的精神，概括为“燕京精神”。每一个在燕大学习、工作过的人，不论时间长短，对这种精神都有感受，但如果要他们用语言描述什么是“燕京精神”，他们却感到困难。<sup>①</sup>有人说，“坚持真理、崇尚民主、办事认真、勤奋进取、热情开朗”是燕京精神；也有人认为，亲密、健康、平等的人际关系，“中国人和外国人，教师和学生都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亲如一家”是燕京精神。<sup>②</sup>可见，校训所代表

<sup>①</sup>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5 页。

<sup>②</sup> 董天民：《燕园杂记》，《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燕大文史资料编委会 1988 年自刊，第 182 页。



的燕京精神，体现在燕大师生的言行、举止与风度上，体现在师生的学习和生活中。正如司徒雷登后来回忆所说：

这一校训很快应用于学校的各个方面，这不仅见诸于学校的精神方面，就连学生的出版物、象征性的图案，人人爱唱的校歌，尤为可贵的是在每一个学生的心灵中，都见有这一校训的深深的印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校训集中体现了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哲理，他们不仅自己立志要去实践校训，而且还以此为尺度去衡量其他的同学。我的一些学生到了共产党那边之后，回来热情洋溢地告诉我，他们如何忠诚地履行了这一校训，为普通百姓做了哪些事情。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他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sup>①</sup>

第五，从某种意义上讲，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促进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教会大学过去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其实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或者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校训是大学校园文化的凝练，是校园文化的灵魂。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讲，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亚文化，可以将社会文化通过各种形式作用于学生；同时，学生也通过校园文化不断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并学习与社会相适应的各种行为规范、知识、技能和生活方式，使自己在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所以说：“教会大学校园内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较高与较深层次。”从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来源看，它们受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而早期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具有明显的西方传统文化的特点。随后，又吸收、融合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特征。圣约翰大学的校训既有英文格言“光和真理”，又有中文格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中西两则格言的结合体现了一种中西合璧的价值取向，表现的是对中、西传统文化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促进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 （二）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消极影响

从上文可知，知名教会大学校训在塑造学生人格和品质、激励学生奋发学习，从而服务社会、促进中西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这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知名教会大学是为传教而设，其校训字里行间，都隐含着对基督教教义的宣扬，其目的是使人皈依基督教。

<sup>①</sup>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史略》，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9 页。



宗教性是教会教育的重要特性。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也反映了这一点。尤其是英文校训的字里行间，更是隐含着对基督宗教的宣扬。圣约翰大学的英文校训“光和真理”中的“光”与“真理”都来源于《圣经》，卜舫济在拟定校训时的目的，是想让圣约翰大学通过人才的培养来传播基督教义的光明和真理。燕京大学的中文校训和英文校训的内容和意义一样，但文字不同。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也来源于《圣经》，司徒雷登把它作为燕京大学得校训，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义，使人皈依基督教。

第二，在校训得倡导下，知名教会大学校风严谨，但过于保守，尤其是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相对于国立大学的学生来说比较淡薄。

在校训的倡导和学校的严格管理下，知名教会大学形成了严谨的校风，但严谨有余，过于保守。他们把培养教会所期望的人才放在首位，在校内制造较浓的宗教氛围，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时政。所以，相对于国立大学的学生来说，知名教会大学的学生政治参与意识比较淡薄。这一点，我们从圣约翰大学卜舫济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来。他在报告中写道：“由于为修建浙江——江苏铁路而接受贷款，引发了一场政治动荡，这些省份的学生都参与其中……而在圣约翰大学，学生在‘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精神的鼓舞下，纷纷加入到由上层绅士发起的募捐活动中。除此之外，圣约翰的学生很是安分守己，秩序井然，没有参加政治运动。”<sup>①</sup>

第三，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所倡导的“服务”、“牺牲”、“博爱”等精神，对学生的人格和品质的形成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实质却是一种基督精神，对学生个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知名教会大学从根本上来讲是为传播基督教的宗旨而办理的。知名教会大学是以培养有影响力、能为大众服务并能引导大众的知识阶层为目标的。他们把为社会服务，看成是为上帝服务，把对人们的爱，看成是耶稣赐给人们的爱。总之，他们所宣扬的，是一种基督精神，在他们的心中，基督精神高于一切，这对学生人格和品质的形成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例如，司徒雷登就将爱国看成是基督精神的具体体现，在爱国和基督精神两者之间，他认为基督精神更重要。他曾论证说：“基督教精神和牺牲精神尤其重要。爱国必得具有高度的服务精神和牺牲精神……只有基督教的福音能产生这种精神，使人无私地为国献身。”<sup>②</sup>在他看来，爱国精神的养成，来源于基督教的牺牲、服务精神。

<sup>①</sup> [美] 费玛丽著，王东波译：《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1 页。

<sup>②</sup> 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9 页。



## 结 语

通过对知名教会大学的校训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知名教会大学校训不仅文字简洁、凝炼,而且寓意深刻;既明确了学校的办学目的,又关注了受教育者人格和品质的养成。校训很好地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对学校及学生个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一些曾就读于知名教会大学的校友,对自己母校的校训仍记忆犹新,绝大部分人认为,母校的校训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激励着他们为社会多作贡献。

知名教会大学校训是探讨校训拟定者各自教育思想的一个视角,通过对知名教会大学校训的内涵分析,揭示了学校主办者的教育目的和办学理念方面的个性化追求,说明了在当时社会转型、政局动荡、国际关系复杂、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知名教会大学取得办学成功的内在原因。校训所蕴涵的教育思想,例如学术自由、服务社会等,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 参考文献

### (一) 中文著作类:

- 1、[美]杰西·格·卢茨著 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2、[美]芳卫廉著 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 1880~1950》,珠海出版社,2005
- 3、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 4、章开沅主编 马敏副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 5、章开沅、马敏主编,王忠欣著:《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6、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7、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 8、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委会编:《燕大文史资料》(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990
- 9、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0、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
- 11、徐以骅著:《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 12、[美]德本康夫人、蔡路得著 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 13、[美]文乃史著 王国平、杨木武译:《东吴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 14、[美]费玛丽著 王东波译:《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
- 15、[美]艾德敷著 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
- 16、刘宝存著:《大学理念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17、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 18、吴崇恕:《世界知名大学校训校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 19、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 20、王运来著:《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21、章开沅、余子侠主编 冒荣著:《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22、章开沅、余子侠主编 程斯辉、孙海英著:《厚生务实 巾幗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23、柯约翰著 马敏、叶桦译:《华中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 24、汪文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25、胡卫清著：《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6、黄新宪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 27、何晓夏、史静寰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 28、刘家峰主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29、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0、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1、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六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2、[美]华惠德著 朱峰、王爱菊译：《华南女子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
- 33、[美]吴小新著 张晓明译：《北京辅仁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
- 34、[美]郭查理著 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 35、[美]海波士著 王立城译：《沪江大学》，珠海出版社，2005
- 36、黄思礼著 秦和平、何启浩译：《华西协和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

## （二）中文论文类

- 1、周谷平、陶炳增：《近代中国大学校训——大学理念的追求》，《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
- 2、田正平：《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5期
- 3、曹秀伟：《基督教（新教）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及其历史贡献》，《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 4、秦立霞：《从传教为主到教育为本——试论近代教会大学角色转变的历史根源》，《江苏高教》2002年第1期
- 5、陈桂生：《‘校训’研究》，《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1期
- 6、李承先、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兼论道德论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
- 7、林为连、张国昌、许为民、郁怡汶：《国内外知名高校校训评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11月第35卷第6期
- 8、汪一驹著 梅寅生译：《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台北枫城出版社，1987
- 9、谭献民：《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2月第2期



- 10、王彩霞：《试探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起源》，《高教探索》2006年第2期
- 11、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年第2期
- 12、殷晓岚：《卜凯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学的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卷第4期

(三) 英文著作类

- 1、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 Notre Dame, Ind., Cross Culture Publications, 1988.
- 2、Hunter, Alan, and Chan, Kin-kwong.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Fenn, William P.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anging China, 1880-1950.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 4、Lutz, Jessie G. 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 后 记

参加工作多年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步入了梦寐以求的桂子山,有幸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三年来,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于老师们对我的关怀与鼓励。余子侠先生、周宏宇先生、杨汉麟先生的谆谆教导,使我没齿不忘。导师喻本伐先生,从收集资料到论文定稿,他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论文成稿以后,多次进行详细的批阅和具有启发性的指导,令我终生受益。先生平易近人之态度,治学严谨之精神也令我终生难忘。

说句心里话,我始终觉得愧对师恩,有负老师和家人的期望。尤其当拙作完成之后,心中更加惴惴不安。所幸的是,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倍加珍惜、努力。

最后,向关心、支持我完成学业的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同窗同学以及家人在此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朱寿标

2007年5月